

徑，換言之，亦即表現其十足的剝削精神。在歷史上，大凡在亂世致力於撥亂反正的人，不論成功與否，大都是「少有大志」，正如項羽所說：「大丈夫當如是也」；在學術上，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充滿了「自我作古」，「語不驚人死不休」，和做「翻案文章」的精神；在社會上，中國各時代都有無數的「畸人」，不聲不響地做着剝削的工作，不過大多數都被斥為「不經」，因此就淹沒了不知名罷了。

由於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斷定，中國人的保守性固然很強，其剝削精神卻不弱。我們知道，民族性的形成，通常由於自然環境，血統遺傳和歷史文化三種力量。就本文範圍而論，中國人的本質是富有剝削精神的，地理環境是發展保守精神的，而文化傳統則一面發揚保守，一面鼓勵剝削。因為這三種力量的趨勢是矛盾的，所以在中國人的性格裏和在中國社會的史實裏常常有保守與剝削兩種精神互相激盪的現象。然而這正是使歷史綿續與文化進展的兩個相足相成的力量，缺了一個，則民族便有死滅的危險。有些人絕對否認中國人的剝削精神，他們不特不明瞭中國史實，並且也無視於人類社會演進的常律。又有些人以為古代的中國人富有剝削精神，而現代的中國人卻沒有了，這也不合於歷史事實。事實是：刺激剝削精神的力量——需要，和便於發揮剝削精神的條件——如政治的紛亂，交通的進步，異族文化的接觸等等，都是現代比古代多，所以社會上剝削的現象，如僑民的冒險，技藝的進步，至少在數量上，現代也比古代多。不過，我們

## 我們需要「平價報」

「勝利愈接近，戰鬪愈艱苦」，所謂戰鬪，並非專限於飛機大戰血肉相持的前方，舉凡一切與爭取勝利最有關聯的部門，如「經濟戰」、「宣傳戰」之類，也都包括在內。固然在這一切艱苦戰鬪的過

也承認，自漢唐以來，中國人的剝削精神沒有像先秦時代那樣表現得如火如荼，這是因為決定保守精神的農業社會與民族環境始終沒有改變過，所以一切剝削的行為大都只能在社會的下層或在變亂之世表現出來，彷彿火饑只能在死灰的下面醞釀着，或偶然自縫隙裏鑽出來一樣。現在的情形卻完全不閉了。我們當前的「大時代」之所以成為大時代者，正因為中西文化的突然接觸，一面澈底改變了我們二千年來的民族環境，一面逐漸破壞了我們的農業社會，這就等於毀滅了保守精神的兩大決定力，強化了剝削的需要，恢復了剝削的自由。所以中華民族的剝削精神含蓄至二千餘年之久，突然以國民革命的形式熊熊烈烈地燃燒起來，其力量為中國有史以來所僅見。我們相信此次抗戰以後，中華民族必然要展開一個偉大的剝削時期，其範圍將逐漸由政治，由經濟，由社會而及於學術，其規模應不下於我國的春秋戰國和歐洲的文藝復興。只可惜社會上大多數的人民還沒有受到現代知識的洗禮，他們的剝削潛力還在死灰下僵伏着，而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雖有了剝削的強烈意向，而學術的營養又不足以實現其剝削的企圖。這都是過去教育失敗的結果，因為四十餘年的新教育始終沒有達成普及文化與發動活力的任務。所以，為着使中國人固有的剝削力量能迅速地發揮出來，表現的淋漓盡致，還非從普及教育與改良教育入手不可；文物剝削的準備，建國大業的完成，我們的教育家實負有不容旁貸的責任。

程中，我們保有許多不可磨滅的驚人優點，但儘量自我檢討，尋求本身缺憾，加以補救，似亦確為當前每一參加戰鬪者必須注意的工作。

成舍我

我是一個終身從事新聞事業的半老「小兵」，現在，且將我所認爲與「宣傳戰」最有關連及最迫切的問題——我們需要平價報，提請大家，尤其我們宣傳當局和新開界的前輩領袖，共同研討。

在最近二十天以前，我從桂林到江西某處，作一兩週間的短期旅行，除衡陽未陽兩大城市外，我曾查三個人口兩萬以上的縣城，和若干個人口五千以上的市鎮住宿，或經過。查這次旅行中，對於一般人認爲難於忍受的苦痛，如汽車拋錨，臭蟲滿床之類，我都極能遵守「素位而行無不自得」及「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的教訓，毫無感覺，其真能使我苦痛的，則是往往一連四五天，看不到一張報紙。我是不能一天不看報的人，報紙常被稱爲「精神食糧」，四五天不看報，實等於四五天不吃飯，是可忍孰不可忍！起初何以爲僅向小市鎮和普通店戶找不到報，萬不料查一個縣城中，向縣黨部及國民小學去找，也都一樣的問答沒有。有一位小學教員告訴我，他們已早把舊報列爲奢侈生活之一，與穿面裝吃魚肉，同爲可望而不可即。他們要知道國事，只有從縣政府門首張貼的一張播音記錄去尋找。但這種播音記錄，也不能一天天貼出，或許天氣障礙，或許機件損壞，也或許主辦的人，另有要公，遂致遺忘，所以他們知道的國事，都是東鱗西爪，不相聯屬。至爲什麼會把報紙列爲奢侈品，就因爲一個國民小學的辦公費，通常不過數十元，筆墨紙燈油茶水一概在內，而一份報紙的價值，總長增高，由每張二角，三角，五角，加至一元，連郵費每月已在三十元以上，幾乎要佔到辦公費的全部。這如何還看得起！小學校之不能不把報紙當奢侈品，其理由在此，縣黨部的情形，大約亦相差不遠。據說，全城只一縣長公署，和兩三位養了國難財的商人，定有報紙，但我和他們不相識，未便煩擾。結果遂使我每天所最臭兀不安的，倒不是汽車拋錨不拋錨，臭蟲吃人不吃人等問題，而是前線情形，盟國戰況，及世界局勢，究已進退到何等境地。每一經過地區，除極少特殊人物，對當前大局，尚能略知梗概外，其餘大抵渾渾噩噩，莫明其妙，老百姓則更多數呈現着「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的

情態。去年九月間，我從桂林循西南國道來重慶，由金城江起，除在貴陽有報可看外，其餘各地，找報也極困難。但或者因那時報價普遍還只到每份五角的關係，故困難程度，似還不及此次嚴重，縣市的小學和黨部，偶爾還能找到一兩份看。如果照此次旅行所得的經歷，繼續推展下去，那麼，將來報紙成爲都市貴人的專利品，連縣政府也找不到一份報的時期，也許很快就會到來。我們的抗戰宣傳，和最多數勤勞大眾，隔離到如此遠速，豈不是「宣傳戰」中一個急須補救的重大缺憾！

國家總動員委員會秘書長沈鴻烈氏，在考察湘贛粵桂等省限政施行情形圖到重慶以後，他曾刊佈一個公開報告，認爲限政宣傳沒有普及民間，是限政成效不佳的最大原因之一。其實當前的許多重大問題，如徵兵難，漢奸多，何嘗不都和宣傳工作未曾普及民間，有着同樣的關連。當七七抗戰初起時，我在漢口大公報發表「紙彈亦可礙敵」一文，對抗戰宣傳，曾提出三個原則——指揮統一，目標集中，對象普及。我極力呼籲，宣傳應以全國軍民爲對象，最低限度，每團有一陣中版，每縣有一地方版。而所有宣傳資料，連題目大小，次序先後，都應完全由中央主管宣傳之總機構編定播發。我提出的口號，是「報紙下鄉」，在那篇文章第一段，我有如下的意見：

「漢奸多，徵兵困難，一到距離戰區稍遠的縣市和鄉鎮，大多數老百姓，即渾渾噩噩，不僅看不見抗戰的準備，連抗戰氣氛，都無處尋覓。一切的一切，這是什麼緣故？我們可以追根溯源，得一個結論：就是我們由過去以至現在，忽略了孫先生一個很寶貴的遺訓，把宣傳太看輕了，宣傳沒有和軍事配合，軍事進展，而宣傳落後，抗戰開始，這情勢還未改變，所以造成眼前種種不良的現象。」

我這一「卑之無甚高論」的呼籲，雖曾得到若干方面同情，而現今業已舉辦尚待擴展，如政治部主管的掃蕩簡報，宣傳部主管的各地簡報，也正就是向着普及軍民的大道前進，但因為戰局變化，和器材

困難，像抗戰開始時我所擬議的三大原則，似都這難即實現。一方面我們上述的宣傳原則，尚須相當時期始可完成，一方面則我們全國各大都市國有的報紙，在此時期，卻更國種種關係，其銷行愈集中於都市本身，其對象愈集中於少數公務員及知識階級。「報紙下鄉」，仍只被視為一種空泛的理想。老百姓沒有儘量普遍受到抗戰宣傳的洗禮，其渾渾噩噩的情境，由我這一年中兩次旅行所見，比抗戰初期還要加甚。因此，除祈禱擴展中央普及全國的簡報計劃，能儘速圓滿奏效外，一方面我不能不提出一個迫切要求，——我們需要平價報。

我國報紙售價，與大多數國民生活水準，不相配合，這早在抗戰以前，就已深刻感到。民國二十年，我在北平燕京大學，講「中國報紙之將來」，曾列舉歐美各國報紙售價，與其國民收入，和我們比較，結果，證明實相差太遠。如以英國一小學教員為例：通常月入二十鎊，即四千八百辨士，購報一份，月不過三十辨士，蓋佔其總收入百分之零點六強。而我國一小學教員，通常月入二十元，購報一份，通常以每月一元計，就須佔其總收入百分之五。小學教員尚如此，更窮苦的勤勞大眾，自然尤不具有購讀報紙的資力。所以中國報紙，始終不能得到廣大的銷路。銷路最大的報紙，自己宣傳，也不過十五萬份。要像英國四大日報，每日郵報，每日快報，每日民聲報，新聞記事報——總額在二百萬份左右，真是無法比擬。其唯一致命的原因，就是報價太貴，老百姓看不起。因此，我曾極力主張，多辦以勤勞大眾為對象，文字通俗，取材精要，一塊錢可看四個月（零售每份一分）的小型報。抗戰以來，我們全國報紙，隨着物價高漲的洪流，即小型報其售價也有增加到每月三十元，甚至三十元以上的。固然一般讀者的收入，亦已增加，然每月三十元，與戰前每月二角五分比增加一百二十倍。至日出一大張的報紙，以戰前日出一大張月售一元為比例，所增亦恆在百倍左右。除了發國難財的特殊人士，誰的薪俸，能有這同等倍數的增加。其不能深入鄉村，普及大眾，那是勢有必至，理所固然的！

所謂「平價報」，正為挽救上述缺憾而起。這一名詞，看來似乎新奇，然而牠的重要，實不在「平價米」，「平價布」之下。且自限價政策頒行以來，報紙所居地位，縱不是民生必需品中數一數二的老大哥，至少也應是八種以下的第九種，可惜大家都不大注意這問題，就弄到連肥皂，牙膏也不如。肥皂，牙膏，還有人替牠議價，報紙的價值，卻始終無人過問。主辦報紙者，遭受經濟環境的壓迫，呼籲無門，不能眼着自己的報館關門，結果，也只好隨着物價洪流的激盪，由戰前每月售價三角五分的小型報，售到每月三十元以上。這當然不是辦報者願意出此，如果國家有一個精密公平的辦法，解除報館當前的困難，那麼，報紙售價，何嘗不可遵照政府管制，減到合理的標準。

三年前，國內報紙售價，通常約在每份零售一角五分至二角之間，我由香港來重慶，某次，偶應某公垂詢關於宣傳方面之意見，我當時會痛切陳述抗戰宣傳不能普及全國的危險。並指出：着物價工資的高漲，報紙售價，恐仍將有增無已。換言之，即抗戰時間愈延長，報紙售價愈提高，一般購買力薄弱的勤勞大眾，愈將與報紙絕緣。我曾提供一個「平價報」的辦法：即報紙售價，聽由政府規訂，而由政府以適當定價，供給各報館用紙。例如政府規訂小型報零售每份一角，報館除去批發折扣，及報紙消耗外，實際收入，平均按每份五分計算。每紙一令印報二千份，是報館印紙一令，可實得報價一百元。政府於價格核定每報確實發行數目以後，即可以每令一百元以下之價值供給報館用紙。其市價高過一百元之損失，概由國庫負擔。倘政府能再將報價減低，仍可依此比例，減低紙價。自來純粹經濟獨立之報館，其營業方針，及收支標準，大抵以發行所入（即售價）抵紙價，而以廣告所入抵薪俸及其他一切支出。其廣告發達之報館，為求增高廣告之效力，尚寧願減低售價至紙張成本以下，冀以推廣銷路。同時，廣告部份之增益，即可填補發行部份之虧損。報價增減，純依紙價為轉移。故政府只須以一定價值，供給報館用紙，報館即自無從高

報價之理由及必要。目前全國報館，紛紛提高報價，其唯一原因，即在紙價高漲。假使，這三年前「平價報」的辦法，能夠實現，則即在今日，相信我熱心為抗戰宣傳努力的全國報業先進，固仍絕對有欣然接受的必勝。

從另一方面看，今日報價最高已漲到戰前的百倍至一百二十倍，而紙價則除白報紙外，任何地所產土紙與戰前白報紙比較，似最高尚未到四十倍。如以重慶為例，戰前白報紙，通常每令七元左右，而今日重慶土紙，限價為一百六十七元，僅當戰前白紙之二十四倍，黑市以二百五十元計，亦僅戰前之三十五倍。現在報價之所以漲到一百倍至一百二十倍，未嘗不是受着紙價漲風，無法預測的一種恐怖心理所支配。因辦報者本身，自然不願漲價，更不願效法一般商品，時時漲價，今日決定漲價時，總希望以後不再漲，最低限度，亦幾個月內不再漲，而紙價之漲到如何境地，則早晚可有極大的不同。今日之三十五倍，安知幾個月內不像幾何級數的上升，由三十五倍而到七十倍，而一百四十倍？故政府只要安定紙價，予辦報者以保障，此種恐怖心理，即自然不再存在。至報館之廣告定價，則政府可儘量放任，聽其自然。因今日一般報館之廣告定價，雖然已比戰前加到

一百倍左右，但仍然還有不嫌昂貴，刊登全版或半版封面廣告的商店，可見商人藉抗戰獲得之利率，遠在廣告增價以上。雖然現在報館的各項支出，比戰前遠未全部加到百倍以上，如戰前一總編輯之薪俸，通常為二百元，今則任何報館，尚未聞有月薪二萬元之總編輯。但若物價工資再有增漲，廣告定價，即再增百分之百，亦無不可。且因報價減低的結果，銷路一定擴大，而銷數擴大的結果，廣告效力一定增強，廣告效力增強，則每一全版封面，像英美報紙的比例，縱售十萬元一天，也自會毫無吝色，有人欣然惠顧。照此辦法，減低報價，對國家固可使抗戰宣傳，普及深入，其所以增強我宣傳戰關力量者至大且巨。對報館，毫無損失，且因供給用紙可減少紙張無限制高漲甚至缺市的恐慌，其必然的收穫，還可大量提高廣告效力，增加廣告收入。——這就是我所建議「平價報」一舉兩利的簡單輪廓。

切盼負責宣傳責任的當局，及全國報界領袖，對這辦法，能予以縝密考慮，倘有實現可能，則報紙向大眾去，最低限度，二萬人口以上的縣，五千人口以上的市鎮，在國民小學和黨務機關內，總不至再找不出一份報紙的缺憾。其於動員全民，爭取勝利，也總不至毫無補益罷。

## 實施新縣制的基本問題

王惠中

### 一 問題的提出

地方自治，是完成憲政的礎石，是建國工作的根本，故我們如果要建設一個近代的民主國家，便非從實行地方自治着手不可。尤其在抗戰期間，積極推行地方自治，更有重大的意義。我們所以這樣說，不單因為抗戰的目的在於建國，而且因為「救」、「養」、「衛」

三項自治工作，與抗戰和建國都有密切關係的緣故。國父所著建國大綱，確定縣為地方自治的單位；國民政府於北伐完成，訓政開始之後，便遵行遺教，先後公佈了縣組織法，鄉鎮自治施行法和縣參議會組織法等重要自治法規，以為栽植地方自治的準則。這些自治法規，就他的內容說，固然不能說是沒有價值，但是因為情形的變遷和抗戰的需要，反映出他們不能夠適應大時代的要求，